

# 以奉献精神 开创中国人口文化事业

王夫棠

和平、进步、发展是整个人类梦寐以求、孜孜奋斗的宏伟目标，也是当今的世界主题。自人类产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繁衍、发展，人类不断抗争，不断进取，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赢得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创造了各个种族、各个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小小地球上的人口已达 56 亿之多，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的人口也已超过了 12 亿！这数目庞大的人口资源，既是人类奋起前行取得更加辉煌灿烂明天的希望所在，又是人类自身与整个生存环境日益加重的负担。人类创造了自身，也背上了自身沉重的包袱。

李鹏总理在 1994 年 3 月 7 日致第十次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会议的信中指出：“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个发展问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宏伟规划，是我们迈向新世纪的发展纲领，描绘了美好的蓝图。但如果我们对有增无减的人口压力不能做出有力且有效的回应，那么任何富有雄心、富有魅

力的发展战略与发展目标都会变为一纸空文。

我们知道，人口、环境与发展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不论国度、不论地域、不论种族和肤色，都面临着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样两个重大问题，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首要的前提是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没有这个前提，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离开这个前提，任何经济发展模式和宏伟目标都将失去其积极意义。

今天，人类已站到了 21 世纪的门槛上，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世界将怎样保持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将以一个什么样的面貌走进新世纪？这是摆在了我们每一个有责任感，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对此，我们不仅需要做出明确的回答，而且更要付诸切实有效的行动。

今后十几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我们既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国际上，我们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占优势的压力，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面临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疯狂推进“西化”和“分化”的威胁。在国内，一些混进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里的“汉奸”和“洋奴”们，改头换面，巧装打扮，把一些腐朽和反动的灰色、黑色和黄色的破烂货，裹上一块迷人的包装，大肆贩卖，欺骗和毒害着善良的人们，致使汉奸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在社会上泛滥，加之商品大潮的逆流和西方文化垃圾冲击着我们的社会、冲击着家庭、冲击着人们的心灵。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所强调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形势很好，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

薄弱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一些地方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一些腐败、丑恶现象又重新滋生蔓延。”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忧患意识。江泽民同志还着重指出“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认为经济的腾飞总是以文化的发展、道德的完善和科技的进步为后盾，其首要条件就是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强盛的民族，愚昧落后的人群建设不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贫穷制约着人类整体素质的提高，而整体素质的提高则有利于早日脱贫致富。有人说，21世纪是经济和科技的竞争，我们认为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人的精神和人的素质的竞争。所以我们说，没有中华民族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出现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盛的中国。

## 一、“人口文化”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在中华大地上生存繁衍、发展着的人群，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前所未有的关怀、爱护和重视。党和政府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今天，在中华大地上，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们肩负着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个关系人类繁衍、生存和发展的伟大而光荣的神圣使命，肩负着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祖国繁荣富强、人民美满幸福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重任。中国 12 亿人口日的推迟到来是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者默默奉献忘我拼搏用汗水、用眼泪、用青春和生命换来的。他们不仅为中华民族为子孙后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

且为整个人类的繁衍、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功绩，必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但是我们知道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这两者是不可分割、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控制人口数量的目标，通过政策性的引导与抑制，可以较为有效地以降低人口出生率来实现，而提高人口素质的目标，更多的应该是强化文化、教育导向机制和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通过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品德水准、科学文化水平和精神风貌等细微的、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工作来实现。它需要将人的一些传统落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观念更新过来，需要将一些陈旧保守与科学文明相悖的思想改造过来，使全民真正从思想到行动，认真理解执行江泽民主席强调指出的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的位置，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的指示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伟大使命，它是在人们头脑中施工，在心灵深处搞建设的一个宏大而艰巨的社会系统综合工程。它的本质是一种人口文化思维，它的社会实践是一种人口文化事业。出于这种共识，1993年初，在宋平同志、彭珮云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偕同人口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文化学、教育学等多方面的专家学者 在广泛的社会学科中提出了“人口文化”概念。

“人口文化”是一个新提法、新学科 但它的存在是与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过程相伴生的。它是人类在繁衍、生存、发展中逐渐形成的 是人类对自身生产、抚育后代、婚丧嫁娶、道德教育以及人的族类、群落、生存状况、生态环境、发展规律、情感、意志、愿望、认识和实践的本质反映与表现。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人口是一种社会现象，人口的再生产和人口发展属于一社会过程，与动物那种简单的、只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增殖、繁衍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对于人口问题的分析与

认识，必须基于一定的社会制度之下，通过对该社会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分析，才可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弄清人口问题的实质。所以 对于人口问题不能只盯住“ 人口 ”这个狭义的内涵，也不能仅仅局限在人口生殖、繁衍的阶段，而应该将视野与角度置于“ 文化 ”这个更为广泛的领域来考察研究，包括人自身的发展、进步等具有社会意义的阶段 这样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生产关系的分析考察之后，虽然我们“ 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 ”即“ 又回到人口 ”上来 但此时的“ 人口 ”已“ 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丰富的总体了 ”。<sup>①</sup>

人口文化的提出，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观，充分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作用，特别是人在完成自我生产的第一阶段后，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更高阶段迈进方面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口文化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和能力的重要体现，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进而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获得的精神成果和文化成果。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考察了人类文明发展史后，提出：人是文化的生物。这种论断是否具有普遍性与科学性，还有待于人类学的进一步探讨，但它至少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 即它的文化性。所以 我们提出“ 人口文化 ”这一概念 决非仅仅在“ 文化 ”一词前加一定语，而是在众多的文化研究中开拓和创立了“ 人口文化 ”这一新的学科。我们认为 在人类生命的全过程以及人们求生存、求发展，改造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中，都蕴含着诸多的人口文化现象，包含着鲜活的人口文化因子。

仅就人类的婚姻状况而言，它便经历了原始群婚、杂婚、对偶婚以及一妻多夫、一夫多妻、一夫一妻等发展阶段，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伴生着相应的婚育观、价值观乃至世界观等文化背景。在人类的生育状况中亦蕴含着极为丰富、复杂的人口文化因子：在母系社会中，由于男性身份不明晰，财产权力要由母性承担，这样，生女便远较生男更能壮大本氏族的力量，整个社会以女性为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特别是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农耕地位越来越高，男丁意味着土地与劳动力，这样又产生了“弄玉”、“弄瓦”之说。生男为“弄玉之喜”，意味着得了宝贝，生女则只能是“弄瓦之喜”，一块小小的瓦片而已。通过这小小的一个方面，我们便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即人口文化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制度、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既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又不会停滞僵化于不变的模式之中。

我们开展‘人口文化’的研究，开拓中国人口文化事业，就是希望通过理论上的探讨与实践上的探索，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人口文化的内涵由社会政治经济所决定，但它反过来必将给社会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影响。它以“人口”为切入点，紧密联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但又不仅仅局限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范围，它的视野，它的范围更为宽广、更为宏大，正如宋平同志指出的：“一个人从生到死，会面临一系列问题，结婚、生育、孩子教育、家庭和睦、养老保障等等，这些都是人口工作的重要内容。我认为‘人口文化’这个概念应该宣传。计划生育是人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口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广……”它在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社会高度进步，生活质量极大提高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口

文化”是宽阔的大文化，人口文化事业是造福千秋万代的宏伟事业。

当然，“人口文化”从理论上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概念，尚待人口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文化学、人类学、教育学、环境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来开拓、研究、充实、完善，共同来建立起一个系统的人口文化理论体系，一门新兴的、有前途的人口文化新学科。我们相信，人口文化理论的发展及人口文化事业的兴盛，将会对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繁荣富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 二、提高人口素质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那就是：“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sup>①</sup> 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必须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相适应，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进步与全方位发展，特别是面向新世纪，科教兴国，在以技术进步，科学发展为主要手段争取中华民族再度辉煌的今天，“人口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内涵已远不是单纯的适度人口数量所能概括，而更大意义上是指社会人口质量状况，如人的科学文化水平、思想道德修养、劳动技能技术、心理和身体健康素质等多方面内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sup>②</sup>。人口文化便是努力使这“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文化素质更高，精神品味更高，心理与生理机制更健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当然，人口文化决不仅仅满足于对人后天的引导与教育。如果生育质量不能保证，一切后期努力皆如同是沙上楼阁。所以，人口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大力提倡优生，重视人口群体遗传素质的优化，致力于改善和提高自身遗传健康。

在千百年来传统观念看来，似乎生育只是男女两性个体的事情，只要两性结合便可出生后代，与社会无关。其实生育质量的优劣，不仅关乎家庭的幸福与快乐，而且更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发展。通过进行遗传普查、遗传咨询、产前诊断、选择性流产以及限制有严重遗传疾病和没有生活能力的人生育、禁止近亲婚姻、选择最佳生育年龄等社会措施，防止和减少劣质和有缺陷的个体出生，会减轻家庭在经济上和实际事务上的负担，既有利于个人和家庭，又有利于社会和国家。就社会而言，提倡优生不仅有益于提高和优化人类整体素质，而且能大大减少社会负担。现代社会是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社会，是文化因素更为丰富的社会，整个社会的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它的成员都应该是有健全体魄、聪颖头脑、巨大创造力的建设者，优生便成了实现这一要求的第一要素。

通常来讲，优生、优育、优教，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是属于人口政策方面的问题，但当我们将其置于人口文化这个视角下时，便会发现，其实这里固有思想观念的影响与作用常常比政策的影响还要大，还要实际。几千年的旧人口文化观念还留存于当今社会，不少人依然未能从“男尊女卑”、“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旧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涌入，特别是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袭，使不少人盲目崇拜婚育生活中的个人自由主义和个人享乐主义。他们以崇洋为先进，以粗鄙为潇洒，以奢靡为荣耀，以性放纵为自由，以无节制生育为人权，是非混淆，美

丑颠倒。为此 必须加大宣传力度 弘扬人口文化思维与观念 通过扎实的宣传、引导、渗透、教育来解决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的种种不正确乃至错误的观念，确立起健康、正确、文明的新人口文化观。

生育是人类的本能，在几千年文明社会的发展中，人类的生育一直是以自然生育为主 即两性结合、受孕、出生、抚育子女都是纯自然行为，这固然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与生存条件所决定的，但也反映了人类的生育行为尚处于纯自然状态，严酷的自然条件总是在天然地淘汰着过多的生育个体、剥夺其生存机会。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存条件有了大幅度改善，于是生育观又开始从自然生育走向自由生育，“想生便生”、“想生多少和能生多少就生多少”，“想生什么性别的孩子就生什么性别的孩子”。这种自由生育导致了社会人口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而且人口的膨胀、性别比例的失调严重损害着正常的社会发展。有鉴于此 提倡‘计划生育’即‘自觉生育’让人们认识到个体生育的权利是与整个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人民自身生活改善的大事，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子孙后代美满幸福的大事。这样的生育观和人口价值观，便是人口文化所倡导和宣扬的重要内容。

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人口文化事业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把“人口文化”与社会文明进步联系起来，并提高到了事业的高度，表现了党中央对人口文化研究寄予了厚望。而且我国政府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计划生育、保护环境为基本国策的宏伟发展蓝图 确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人口政策和人口目标 在“三为主”的基础上 落实“三结合”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文明奔小康、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结合起来，为中国人口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前景。中国

人口文化事业可以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地去推进社会文明进步。

人口文化事业以其广泛的包容性和丰富的内涵，为沟通计划生育与保护环境两大国策架起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桥梁。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社会进步与发展，摆在人类面前的新课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人既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依赖生存于自然界中，又作为社会存在物对自然界有着改造、征服、利用、占有的能力。但这决不意味着人类可以毫无节制地、盲目地开发和利用大自然，如果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占有和利用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那么人类便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将会走向深渊。如果人类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盲目猛增的势头和尽快改变全球环境严重污染、自然资源严重锐减的可怕局面，继续恶化生态环境，那么就是人类自己在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是人类自己把自己推向绝路。恩格斯早已向我们提出过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每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sup>①</sup>所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取决于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而且取决于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爱惜，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要保持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环境优化，必须以保持一定的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发展规模及相应的人口密度为前提，否则，人口因素在客观上可能成为生态环境的破坏因素。1995年7月世界人口日，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举行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行动宣言”青少年签字活动，便是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控制人口数量和保护环境结合起来，在青少年中宣扬我们的两大国策，增强他们的人口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现代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纲要》指出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文明、健康发展。而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较高的人口素质作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狠抓人口质量的提高。因为只有高素质的人口群体，才能真正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的生存环境，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建设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去换取一时的物质享受。人口文化正是给人以健康、文明的生存观念与生活态度，造福当代，泽及子孙这是我国在跨世纪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人口文化事业刚刚起步，但它却步步深入，遍布社会各个领域，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和一系列服务活动，拓展自己的空间，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对吉林省计划生育战线出现的计划生育与发展经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的“三结合”模式 对江苏盐城的“富帮穷、党员帮群众”并把独女户、双女户组织起来 建立“少生快富文明工程”进而发展到四川成都、德阳等地积极推广和实行“三结合”大好局面的讴歌与宣扬，把人口文化这个宏大而艰巨的社会综合工程，从社会引入家庭，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加速农民群众婚姻观、生育观的转变等等。总之，人口文化事业的开展对极力倡导、促成健康的社会风尚和人生正确而崇高的生活目的，为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

现我国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着积极而深远的社会作用。

### 三、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工作的回顾与前瞻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 以“人口文化”的提出与宣传为契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指出:“发展中国人口文化,造福后代振兴中华。”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同志又指出:“开创人口文化 促进社会文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支持下,1993年7月,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正式成立。江泽民主席为此发出:“发展人口文化事业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指示,李鹏总理题写了“提高人口素质,促进民族文化”的贺词。宋平同志欣然担任名誉会长,彭珮云同志被推举亲自担任会长,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国家计生委等中央、国家十多个部委负责同志担任副会长。所有这一切,充分表明中国人口文化事业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和所具有的强大的推动力。

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成立三年多来,团结了一大批有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和事业心的人口学专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计划生育工作者和理论宣传、新闻出版界的爱国人士,通过各种渠道组织大型文艺演出宣传人口文化,拍摄《福兮祸兮》、《龙凤乡的婚事》、《长白山下的姐妹们》、《痴情》等反映人口文化内容的影视片,举办了两届规模盛大的中国人口文化博览会,评选颁发了三届中国人口文化奖,举行了人口文化理论的研讨与培训,承担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计划生育和社会文明进步 为弘扬敬老、爱老、养老的民族美德 倡导优生、优生、优教 讴歌真善美 抨击假恶丑 呼唤文明 抵制愚昧 呼

唤正义 抵制邪恶 净化人们心灵 陶冶人们情操 提高人们的整体素质，进行了一系列的卓有成效的活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今后将坚持下去，并将人口文化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成立伊始，便把目光放到广大的基层、农村，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中。每年都多次到基层为群众服务。1995年9月，经多方努力运作，在山西省一个贫困县建立了“山西河曲人口文化教育基金会”，为促进农村的教育事业开了个好头。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的同志们深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自觉地把工作重点放在为群众服务并同时引导教育群众方面，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只希望为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例如我会坚持在每年春节期间，派专家艺术团离开北京，走向基层深入农村慰问演出，1996年的春节（农历正月初三）南下广东，为当年东江纵队的根据地惠东县人民慰问演出。并在那里举办了“爱我中华 禁绝毒品”的大型宣传活动。呼唤文明、抵制愚昧。活动生动活泼，社会反响强烈，被誉为“国家级水平，一流的艺术享受”。特别是时值建国以来广东最寒冷的天气，专家们穿着单衣在八面透风，破旧的农村舞台上演出，乡亲们颇为感动。

青年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新世纪的主人。中国人口文化事业繁荣兴盛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极端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与教育，先后把北京大学爱心社、清华大学求是学会等高校的学生社团，接收为团体会员，并多次到高校为青年学生办讲座，在高等学府的讲坛上传播着人口文化的思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投身于中国人口文化事业。

人口文化事业是高尚的事业，文明的事业，爱国的事业，它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社会综合工程，是一切爱国者为之奋斗的伟大

事业。我们相信，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在名誉会长宋平同志、会长彭珮云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繁荣富强，为世界的文明与进步而努力奋斗，就一定能把中国的人口文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种理论的诞生，总是伴随着人类自身的艰辛实践。刚刚起步的中国人口文化事业，需要继续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和拓展。中国人民将以什么姿态、什么形象进入 21 世纪，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时代课题。我坚信在中华大地上生存、繁衍、发展着的的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 大好的河山。几千年的民族发展史 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险和艰难、困境和挫折 倍受侵略和屈辱 但是 中国人民总能从困境和挫折中一次又一次地昂起头来，战胜困难，克敌制胜 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凝聚着 56 个民族，维系着亿万人民的心，激励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巨大精神力量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就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生生不灭的爱国主义传统。只要我们高高举起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大旗 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定能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还相信，中国人口文化事业，必将随着民族的兴旺而兴旺，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它的未来同样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

## 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口文化的粗浅思考

杨魁孚

人口文化这一新概念是我国在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过程中，于 1992 年提出来的。但人口文化现象和观念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存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口文化也各不相同。人口文化乃是一种历史现象，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形态的文化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人口文化也是如此。

人口文化作为一个新概念，大家对其内涵的理解不尽一致。我个人理解，人口文化主要是指人类在婚育繁衍方面形成的观念、风俗、习惯、制度和道德，简而言之，是否可以说，人口文化就是关于人口繁衍的文化。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它是社会主义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一、妇女在人口繁衍中的作用和 人口繁衍状况的历史变化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要延续下去，必须通过人口的不断繁衍和更新。由于生理的原因，妇女在人口繁衍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贡献，她们承担着孕育、生育和养育子女的重担。

在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曾有过漫长的杂居阶段，男女之间是一种杂乱的群婚制，性关系十分杂乱。妇女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频繁生育，人口出生率很高，死亡率也很高，自然增长率很低。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人类从群婚制的杂乱性交状况转变到血缘婚制和血缘家庭。又经过漫长的繁殖过程，人们开始认识到血缘婚配对生育后代的不良后果，从而形成了排斥同胞兄弟姐妹之间通婚的观念，逐步形成了禁止血缘婚配的习俗和制度。这是原始社会人口文化的一大进步。在原始社会，人们非常想增殖人口，于是就崇拜生殖，崇拜生殖器。

伴随着原始社会公有制经济的瓦解，财产私有制的确立，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并最终形成了女嫁男、从夫居的婚姻家庭形式。在我国西周时代，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奴隶制社会婚姻制度，并明确了婚姻的实质就在于宗族的延续。从宗族的功利出发，娶妻就是为了有后（生男孩），纳妾是为了多子，还肯定了男女在婚姻地位

上的不平等。在周代已确立了比较完备的家庭制度，由男子充任家长，在家庭中处于最高地位。宗族家长制度的确立使妇女地位明显下降。家庭产业都由父子相继，世代相承，只传其男，不传其女。这时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已表现得非常分明，在夫妻之间也形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丈夫可以随意抛弃妻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sup>①</sup>

我国周代重视人口繁衍，鼓励生育，禁止同姓婚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征战称雄，补充兵源，增加剥削收入，大力主张增殖人口，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并运用法令制裁晚婚者，奖励多生者。当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部分都主张增加人口。孔子认为人越多越好，他说：“地有余而人不足，君子耻之。”他还认为要尽孝道就必须繁衍子孙，世代相传，永不绝后，这种思想被后来的儒家学派进一步发展了，对于我国人口生育文化产生了很大很深的影响。墨子也认为“人不足而地有余”，提倡早婚，主张男子 20 岁娶妻，女子 15 岁出嫁。管仲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增加人口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以韩非为代表提出了主张控制人口的观点。韩非生在入多地少、粮食缺乏的韩国，他看到了财物不足与人口增多的矛盾，这种朴素唯物主义人口思想是可贵的。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增加被剥削的劳动力和增加租税，大都采取鼓励多生育的措施。例如汉高祖刘邦采取许多措施鼓励增殖人口，奖励生育，提倡早婚。唐太宗曾下诏鼓励男婚女嫁，提出男 20 岁、女 15 岁就要结婚，并以户口增减来考核地方官吏。但到了清朝，面临人口大增而粮食紧张的状况，康熙、乾隆皇帝对人口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2 页。